

历史的回顾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和发展

(美) 托马斯·F·特罗伊 著



群众出版社

历史的回顾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由来和发展

(美) 托马斯·F·特罗伊 著

狄奋 李航 译

群众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历 史 的 回 顾

(美)托马斯·F·特罗伊 著 狄奋 李航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65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67.354 定价: 3.30元

ISBN 7—5014—0101—2/D.64

印数: 00001—12000册

THOMAS F. TROY

DONOVAN AND THE CIA

A 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根据英国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81年版译出

出 版 说 明

中央情报局的成立，是美国情报和特工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美国政治和军事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书原是由中央情报局委托作者研究，于1975年写成的专供该局人员阅读的机密材料。作者广泛查考了军政等有关部门档案材料，详细叙述了中央情报局的缘起和创建过程，对美国情报和特工活动作了系统的回顾与总结。

对原书中冗长之处，译者作了删节和节略。文中带引号的文句，原书都有注释注明出处，译文一概从略。原书注释中有关叙事的实质性内容，已分别加入正文译文中。书中有很多粉饰和吹嘘美国政治制度和情报、特工活动之处，需请读者在阅读时加以注意。

序 言

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其中的新手或年青业务人员的需要，使他们全面而详细地了解中央情报局的历史渊源。本书写成于1975年，属于“机密”级材料。经过最近对于保密文件的密级复审，本书现已解密，删掉的总共只有打字稿的6页材料。对原稿中某些不确切、不清楚的地方，在用词上作了改动，或者增、删了一两句话。

本书的内容不是罗列美国情报史中的轶事，而是系统地追溯和叙述作为美国政府组织结构当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的中央情报局的演变发展过程。在中央情报局之前，曾经成立过由杜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为中央情报局培养了专业人员，积累了经验，留下了它的情报技术、指导方针和传统作风。1944年，杜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了一份在和平时期建立常设的中央情报机关的计划。1945年9月20日，杜鲁门总统撤销了战略情报局，其中某些可以利用的部门划给了国务院和陆军部。4个月之后，杜鲁门以战略情报局的这些保留下来的部分组建了中央情报组；又过了18个月，他和国会又改中央情报组为现在的中央情报局。本书的主旨即在于说明，中央情报局在实质上历史地体现了杜诺万提出的关于中央情报机关的开拓性的构想。

由本书撰写之时起，中央情报局和整个美国情报工作经受了种种谴责、揭露、调查和改组。假如现在来写，可能散散落落有些地方的写法会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并不需要修改或重写。需要补充说明的只有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驻美情报负责人威廉·S·斯蒂芬森爵士对于美国建立中央情报机关所起作用问题。首先报道这个问题的是H·蒙哥马利·海德所著《一个隐秘的加拿大人》（美国版改名《3603号房间》）。最近，一个与威廉·斯蒂芬森同名的作者写了一本《号称无畏的人》，重述了这个问题，情况讲得令人惊叹，但不是以能公开得到的第一手材料为根据写的，因而许多提法和细节无从查考。书中说杜诺万曾讲过，他同斯蒂芬森首次见面是1916年在英国，谈的是德国在军事和心理方面的弱点。1940年据杜诺万本人说，他是在1940年8月从伦敦回到美国之后才同斯蒂芬森认识的。这两种说法直接抵触，是个未解的问题。再者，那本书中还说，1940—1941年期间，斯蒂芬森在华盛顿同罗斯福总统的定期会见不但是机密的，而且连任何美国官员和驻华盛顿的英国官员都不晓得。对这种说法必须有所保留。我的看法是，珍珠港事变之前，斯蒂芬森同罗斯福的所有联系都是通过J·埃德加·胡佛或者总统的私人朋友文森特·阿斯特的。

第二点是关于1945年杜诺万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分别提出的两份战后建立常设中央情报机构计划的“泄密”问题。杜诺万直接怀疑到是J·埃德加·胡佛泄露给《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沃尔特·特罗安的。我在本书中提到，如果是胡佛捅出去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的。从那一年起，后来又发生的几起“泄密”事件的情况看，陆军情报部的人很可能参与了其事。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同特罗安联系上，搞不清楚究竟如何。后来，我同特罗安见了面。他说，是总统的秘书史蒂夫·厄尔利找了他去，把文件给了他，告诉他“罗斯福希望把这个情况捅出去”。但是，我在本书中已经叙述了杜诺万同罗斯福的关系，怎样才能同特罗安这个说法对上茬呢？罗斯福的意图和作法怎么会是这样呢？都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为了对历史负责和公正地对待胡佛，且把特罗安讲的

情况录此备考。

托马斯·F·特罗伊

1981年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协调局	(1)
第一章 缔造者	(1)
第二章 战前的美国情报机关	(5)
第三章 杜诺万上校	(32)
第四章 情报协调局的成立	(53)
第五章 创业伊始	(77)
第二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情报局	(127)
第六章 从情报协调局到战略情报局	(127)
第七章 夏季的争论	(180)
第八章 仲冬的战斗	(214)
第九章 杜诺万的计划	(257)
第十章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	(285)
第十一章 战略情报局的攻势和守势	(322)
第十二章 战略情报局的撤销	(358)
第三篇 战后的中央情报局	(383)
第十三章 领导问题	(383)
第十四章 杜鲁门的国家情报管理委员会和 中央情报组	(405)
第十五章 进展和问题	(432)
第十六章 中央情报局的成立	(456)

第 一 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报协调局

第 一 章

締 造 者

中央情报局是许多人締造的；其中有两位总统，几位陆、海、空军军官，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还有一位解下戎装的军人。这里要扼要评述的种种说法，不但道出了中央情报局締造史中的主人公和若干人物，而且揭示出一个叙述这部历史的起点——发生在1929年的一件事情。

珍珠港事件并非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最初起因。但是，应当首先提起的就是这一事件对于建立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意义。1955年，胡佛委员会在关于政府行政部门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讲了下面一段话，大致是不错的：

中央情报局之所以成立，可以归之于珍珠港遭到的袭击，可以归之于战后进行的一项调查——我国武装部队未能及时得到日军即将进攻的充分警报，与有无情报机关关系如何。

经过那次调查之后，对于必需搜集和运用一切有关情报，以使国家首脑能够预作措置，先发制人，挫败别国危及本国内外安全的敌对性计划，在美国几乎是人人深信无疑的了。“毋忘珍珠

港！”这个口号便是从死亡与灾难中总结出的一致意见。它无可怀疑地奠定了舆论的基础，战后立即展开的一场关于建立常设对外情报机构的争论，也就因而成为权力大小与作用如何之争，而不是争论有无必要了。中央情报局于1947年成立，反映了公众的决心——珍珠港事变不容重演！

然而，按照曾任大使的乔治·S·梅塞史密斯的说法，远在形成这种舆论之前的1939年，罗斯福总统已经“率先”构思了导致建立中央情报局的“开创性计划”。梅塞史密斯指的是部际情报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反间谍组织，在其一切潜在力量之中毫无积极力量。罗斯福的确贡献很大，却是在其它方面，特别是他建立了由当时是上校的威廉·J·杜诺万（人称“野人毕尔”）领导下的情报协调局。

为建立中央情报局作过贡献的另一位总统是杜鲁门。从他的备忘录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很明白自己所起的作用。他正是由于体会到有必要对于情报工作加以协调统筹，才大力推进成立中央情报局的计划，以总统身份签署了建立中央情报局的法律。多年以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把中央情报局看作乃父的“最荣耀的业绩”。不过，杜鲁门作为总统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可否认的，却并不是开创性的。在他参与其事的时候，已经是接近瓜熟蒂落了。

认为陆、海军军官是中央情报局缔造者的说法有三种。其一，陆军上校西德利·F·马什伯说过，是他和海军上校埃利斯·M·扎卡赖亚斯（后来升为海军少将）“按照海军五星上将欧内斯特·J·金的意向……制订了最初的方案和具体实施的训令，后来一步步发展成为中央情报局。”在他们看来可能是如此；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看法乃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短见。其二，据海军部关于海军情报机关的一篇文章说，另一位海军少将小C·M·库克提出的计划，是促使“官方迈出第一步来建立统一的战时情报机构

的主要因素。”这便是他迟在1942年提出的建立“战时新闻局”的建议。然而，库克同扎卡赖亚斯和马什伯都不处在事情发展的主流之中，而是在主流之外的军事方面。其三，勒德威尔·L·蒙塔古上校（后来在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报估价委员会任文职官员）认为，中央情报局并非象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源起于杜诺万在1944年提出的建议，而是源起于“陆军情报部制订政策人员的成熟得多的理论思想”，特别是由于这种思想是他本人制订的。这种说法下面还要展开研究。这里可以指出，若不是杜诺万加以推动，陆军和其它部门靠本身的力量决不会有这样高的抱负。

英国人说起对于中央情报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是以缔造者自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从事情报工作卓有成效，因而被英王乔治六世授予爵士勋位的威廉·S·斯蒂芬森说过，他领导的组织对于杜诺万的情报协调局“起了重要的培育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是情报协调局的母体”。本书将要详细研究这种说法。这里只消指出，对于斯蒂芬森这段真正引人神往的经历，必须当成是杜诺万的经历来看。

至此，读者一定猜想，这场戏的主角是那位解下戎装的军人威廉·J·杜诺万。杜诺万是爱尔兰血统的纽约人，信奉天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上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少将，两次大战之间则作过律师和行政官员，是个政界人士。1941年12月8日凌晨两点，罗斯福总统对杜诺万上校说：“你促使我建立起情报机关，真是一件大好事”。的确，“促使”罗斯福总统“动手解决”这个问题的，作为外国情报搜集与协调工作第一任主官为美国效力的，在意见被人否定之后又凭藉自己的创造力、魄力和领导才干使人折服而去实现自己的计划的，正是杜诺万。

然而，最早察觉美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对政府各个情报单位搜集和提供的情报加以协调的，还不是杜诺万。在杜诺万出任情报协调局长之前整整十年，就有一个至今名不见经传的约翰·A·

加迪已经注意到现时所谓的“情报战线”所存在的弱点，并且建议以设立中央情报组织作为补救。1929年春天，杜诺万离开在华盛顿所任公职前往曼哈顿筹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加迪在纽约正在干一件事情：他写了满满七重纸的一份分析和建议材料。我们正好由这份材料开始来介绍杜诺万于11年之后作为美国首任中央情报主官执掌大权的那个情报机构。

第二章

战前的美国情报机关

约翰·A·加迪出生于1875年，曾经当过建筑师，1918——1919年任美国驻哥本哈根海军武官，还曾在波罗的海国家出任美国国务院的代表。1929年，他在纽约一家金融公司做事。说不清当时他为什么对于情报工作发生了兴趣，反正那年刚一入春，他就向曼哈顿的海军分区情报官格伦·豪厄尔中校提出了一份建议，希望成立“某种形式的中央情报机构，直接对胡佛总统负责”。他打算“在将来某个时候”把这个建议向总统提出。

1929年4月25日，加迪和豪厄尔中校在戈文诺斯岛会见了当地的陆军情报官O·H·桑德斯少校，三个人一起讨论了加迪提出的建议。

“国家情报机关”

加迪认为，美国的“对外情报单位”非常“孤陋寡闻”，原因是组织不善，特别是缺乏协调，没有一个能够把得自各种来源的所有情报加以“整理分类、分析比较、鉴别筛选并提供给需要情报部门的‘交换站’”。他说，美国的驻外商务代表、陆军武官、海军武官，确实都奉命相互交流有价值的情报；但是，由于“观点分歧、相互妒忌等等阻力”，例如唯恐暴露机密的情报来源，因而障碍了情报交流。情报部门还“事倍功半地重复劳动”，往往可以发现，一个使馆里的各种武官、随员，都在各自“搜集同一问题、同一事件的消息”。

同外国比较起来，“人家是行家里手，我们是幼稚外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使我们看到英国、法国“高度发达的陆、海军情报部门”及其“广泛伸展的秘密组织”是如何运作的。美国学到了很多東西，也建立了许多有价值的联系，而这些收获现在又“大部分”丢掉了。加迪很欣赏英国的情报系统，在建议中以之作为改造美国情报机构的范例。

英国情报机关的“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有数量之多使人难以置信的英国公民，不论政府是否视为公务人员，都肩负重担”，成为英国情报系统的“臂膀”。海军、陆军、贸易部、内政部、外交部、殖民部等等系统的每一个行政单位，都“不断向各自的总部报告”使人感到兴趣的重要消息。伦敦收到的消息，已经“经过筛选”，其中“被认为可能具有影响到国家的重要意义的消息，都交给各部负责与中央资料室联系的联络员，这个资料室又同政府行政首脑随时保持联系”。“所有点点滴滴、难以判明、似难凭信的情报”，都在中央资料室汇聚起来。按照加迪的观点和术语，“英国情报之轮”和“情报机关的轴心”，便是如此运转的。

当然，由“轴心”向四面八方放射出许多“幅条”，通往各种报告消息的“情报站”以及行政单位和公民个人。加迪说，这个情报之“轮”在和平时期照样运转，搜集和处理贸易、商务和经济方面的情报；一到战时，就顺利便当地扩充起来，以适应紧急军情的需要。不管在平时或战时，英国情报系统由于“重复劳动极少”，“行动稍有偏差”很快便得到纠正，所以开支非常节省。他还给英国情报机关捧场说，“暗探手段是遭到反对和被禁止的。”

加迪认为，美国要是建立起这么一套情报系统，同样会取得实效——原始的资料会比较充分地得到利用，行政首脑会消息比较灵通，法律的实施也会得到加强。他很明白提这种建议是同谁打交道，所以紧接着就提出，现有各个情报部门的作用不会由于

建立全国性的政府情报机构而有所削弱，而且会由于不断从这样一个中心组织得到反馈信息，而使士气得到鼓舞，提高效率，扩大成绩。他还考虑到国会和公众的反映，强调指出这个机构不会成为“每一个理智的美国公民所强烈反感的一个庞杂的国家特务机关”。

加迪还提出了对这一计划进行研究并使之得到总统和陆军部、海军部以及“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的情报主官”赞同的程序。他认为，“设想中的国家情报机关”最后自然应当设在国务院这个“高级部门”，但是暂时以独立运作为好。他说，英国就是这样做的。由于眼下没有开办这样一个“交换站”的经费，人员可以向各个情报单位借调，而“某些特别适合的人员”也许包括他本人在内，因为他在1933年重新担任驻布鲁塞尔和里斯本的武官，又在海外服务了6年多，直到65岁才退休。关于国家情报机关的首脑，他也提出仿照英国的办法办——他说，这位“主官”一般都是一位只有最高层人士才了解其使命的海军上将。自然，这个机构也不得公开。

从加迪的所有经历来看，他决不是评论美国情报机构是非功过的权威。他对于英国情报体系的长处无疑想象得太过份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协调一致。而且，英国搞特务活动的历史很久，可以一直追溯到伊利莎白女皇任用的弗朗西丝·沃尔辛汉爵士。英国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对使用“暗探手段”，加迪的观点肯定是太天真了。

尽管如此，加迪对于美国许许多多情报单位在工作中相互矛盾、相互争斗倒是颇有体验，足以看出根本的弱点来。这样，他才能够第一个想到对情报单位的活动需要更好地加以组织，从而在1929年超越所处时代提出了建立中央情报机关的设想。他触及了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也考虑到了某些争议。但他的建议对于十年以后才掀起的有关此事的讨论没有任何有机的联系。与他

同时代的人无一为他所感动。

当时，豪厄尔中校和桑德斯少校都把加迪的建议发往华盛顿呈报给各自的上司。在美国海军部的海军情报局，H·C·库克上校指出，这份建议，“在理论上似乎非常高明，实行起来也可能行得通，但是会耽误情报材料的通报速度。”无论如何，“中央机构”不能取代海军的情报机构；海军情报机构仍然必须不仅同自己的驻外武官联系，而且还要继续同派驻华盛顿的外国武官打交道。库克的结论是，“海军情报局不能放弃自己肩负的战争情报重任”——每一个单位都会随之作出同样的结论。

陆军情报局对于这份建议的评论比较粗鲁。他们怀疑加迪根本不晓得建议设立的这个组织得有多么庞大，怀疑加迪大概是从小说上看到过什么搞情报救国的“传奇英雄”。他是否想过由谁来对情报进行评价呢？由谁来判定情报呢？如果情报不完整、不明确，某个部门据以采取了行动，又由谁来负责呢？

提出这些问题的库珀上校承认，“许多政府情报单位的工作有改进的余地”，但他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加强情报的评价工作，……而不是整顿情报机构”。每个情报单位都应当自行搜集情报，由本身的适当专家予以评价，然后自行通报。如果各个情报单位之间建立适当联系，就“不会产生什么重复”。库珀认为，按照加迪建议的体系，就得增设“同每一个情报单位（海军部、陆军部、商务部等等）对口”的新单位，纯属毫无补偿的“额外负担”。他的结论是，“我认为一无所得而困难甚多。”

持如此看法的非只库珀一个。5月9日，陆军情报局局长斯坦利·H·福特上校退回库珀写的意见时附了一份潦草写成的批语：“此件存档。……我已同桑德斯少校及海军情报局的约翰逊上校谈过，都同意你的看法。”

加迪试图对美国各情报单位的工作加以协调的尝试就此告终。他的尝试失败了，因为各个情报单位的主官都说不行，而他